

进外交部担任周总理和毛主席的翻译

黄书海不平凡的经历之(二) I

大使馆八年半

1954年底,由领事馆安排,我乘机从棉兰飞抵雅加达。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充满新鲜感。先期到大使馆的杨国坚到机场接机。从此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

中国大使馆座落在雅加达卡查马达大街中段。两扇大铁门和四周高高的围墙,把墙内墙外两个“世界”隔开。墙内是新中国外交机构的领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从这天开始,我就属于这个新体制的人。

我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和满腔热情进入大使馆。我必须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从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融入这个新体制。

“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这股从延安刮过来的清风扑面而来,让你精神为之一振,身心特别舒畅。

年轻人的优势就是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比较容易吸收,比较容易接受改造。

我被安排在使馆调研室,国坚在武官处。调研室只有五六个人,由陈叔亮政务参赞领导,康岱沙二秘为室主任。我是唯一的印尼文翻译。第一天上班便开始工作,没有什么过渡期。

每天上午要审读一大摞的印尼文报和通讯稿,然后向主管参赞和主任摘要汇报报刊主要内容,并根据他们指示,将其中重要的社评和报道翻译成中文,以便他们写调研报告时参考使用。

当时使馆全体同志正在为迎接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亚非会议忙碌着。我并不知道会议期间,中印两国政府还将签署有关解决印尼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一天上午,中方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林兆南到调研室找我。他说,请你把这份印尼政府提供的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印尼文版本尽快翻译出来,明天上午要用。其他工作可以先放下。

我说,我对法律文件很不熟悉,可否请陈丽水同志来翻?他说,陈丽水是参加谈判的翻译,你没有参加谈判。作为局外人,凭你的理解,把它翻译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看出,哪

些条文容易引起误读,哪些条文与中文版本有出入。

我一下子明白了林司长的用心,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我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任务。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解决法律专有名词和条约惯用的语句,确实遇到不少困难。第二天交卷时,林司长对我能按时完成任务,甚感满意。我也如释重负。

后来,我才知道林司长是新加坡归侨。早年回国参加革命。他对华侨干部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万隆亚非会议前夕,使馆工作虽然很忙,但主管人事工作的朱霖秘书(黄镇大使夫人),还是找我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她要我在规定时间内,写一份政治自传,内容包括来使馆前的学习、工作,以及对印尼社会、对使馆工作、对自己的思想认识等等。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组织审查吧。

我很乐于让组织了解我,审查我。

我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写完20多页的自传,如实地讲述我的家庭情况、经历,以及对华侨商业社会和旧我的思想认识和剖析。

朱霖看后说,“认识还不错。今后还要认真学习《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我还根据她的建议,写信给瑞玲,让她尽快回国学习。我将来也会回国。

1954年底,瑞玲领取了回国护照。但没有马上启程,等待我到使馆后的消息。瑞玲接到我的信后,义无反顾地决定于1955年6月回国。

我们恋爱马拉松从1950年到1963年,足足跑了13年。其间受到时空的挑战和考验。

1963年瑞玲大学毕业,我们在北京结婚。2013年分别在深圳和北京与亲属庆贺金婚。实践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古训。

大使馆的工作和生活,对我来说充满新鲜感。

第一堂必修课就是:确立严格的保密观念,做到内外有别。怎么做,就要靠你的自觉和悟性。

我到使馆后不久,卢涵洲到使馆来访。我和杨国坚与他会面。按使馆规定,出门必须二人同行。我和国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闭幕式上发言

坚陪涵洲在使馆附近华侨餐厅吃了一顿饭。席间交谈不欢,很拘谨。因为我和国坚在使馆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都不能对外谈。交谈只能是一边倒。我们发问,他谈他的情况。

事后,我估计,涵洲对这次会面一定很不满,觉得我们变了,摆起了架子。

20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纽约的涵洲来京旅游,请我和国坚在北京吃了一顿饭。交谈中,谈及50年代初,我们在雅加达的会面,果不其然,涵洲对此还耿耿于怀。我向他解释说,当时我们刚到使馆,政策水平不高,在执行使馆规章制度方面显得僵硬、教条。谨此向他表示了迟到的歉意。

《礼记》上说:“入竟而问禁,人国而问俗,人门而问讳。”到使馆工作,熟悉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这是做好工作,避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条件之一。

使馆并不干预个人与外界通信,但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如不谈使馆内部和自己的工作情况,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主动中止了与外界的私人通信。

另外,加强敌情观念很重要。当时敌特对使馆的监视、收集情报、策反、施美人计等等罪恶活动,甚嚣尘上,你不得不倍加防范。

瑞玲回国后,我只保留和她私人通信。使馆人员的信件和文件都是靠信使传递,很安全。

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我刚到中国驻雅加达大

使馆工作不到半年,就有机会近距离见到周总理,并参加周总理和全馆人员集体合照。感到无比幸福。

当时,我在大使馆研究室工作。在政务参赞陈叔亮及其夫人、研究室代主任康岱沙带领下,我们先期到达万隆。我们这个翻译班子负责每天为周总理和代表团提供印尼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各种报道和评论。

记得就在1955年4月1日夜,大约11时,我翻阅刚收到的印尼安塔拉通讯稿,突然被眼前几行字惊愕住:“一架运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749A型客机在北婆罗州(加里曼丹)纳土纳群岛海面坠毁……”我的脑门好像被重重一击,嗡的一声,思绪一片紊乱,握住稿件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

坐在对面的政务参赞也感到像晴天霹雳,但他毕竟是老同志,坚定沉着。他握住我的双手说:“沉住气,仔细往下看,念下去!”

我把这则快讯重复念了好几遍,想要从中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周总理在不在机上?”“飞机为什么会坠毁?”……一连串问题就像一块块巨石,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在场的人除了面面相觑,只有焦虑和沉默……

直到翌日清晨,情况才渐渐明朗:周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并没有乘坐该机。大家为此松了口气,但同时又为乘坐该机的8位中国代表团先遣工作人员和波兰、奥地利、越南3名记者的罹难感到

万分悲痛。这是蒋特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亚非会议结束后,国际舆论,特别是印尼新闻媒体,对周总理驾驭国际会议的超凡能力、化解矛盾的外交艺术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都作了大量的评述和赞誉。

这些赞美之词并非客套,而是由衷的,中肯的。

蒋特阴谋杀害周总理,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事件,不仅震惊了中外,也给像我这样刚进入使馆工作的华侨青年干部,上了一堂血淋淋的阶级斗争课,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蒋特的阴险残暴,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终身受益。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了拥有伟大英明的领袖和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外,钢铁般的组织纪律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1956年,召开全馆党员大会,讨论陈丽水、郑钦美、陈文营等同志入党问题,组织上也让我们这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大会,接受生动的党课教育。

入党者的坦率陈述,同志们对入党者的肯定、剖析和批评,对我启发很大,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我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敬佩,一心向往。

记得我在《苏门答腊民报》工作时,我的小学同学张大永奉印尼华裔领袖萧玉灿之命到棉兰出差,我们在报社相遇。除了寒暄和互叙别后各自情况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劝我加入印尼共(PKI),我不假思索地说,不,如果要加入,我只愿加入PKT(中共)。这是一次很有趣的对话。

20世纪90年代,我到深圳探亲,得悉张大永也居住深圳。棉兰一别,我们已有40多年没见面了。

我很想了解印尼“九·三〇”事件发生后,他是怎么逃离虎口的?于是我电话约他到我的住处相聚。我还同时邀请王谦宇老师、李润玉大姐和夫婿杨锦星起会面叙旧。中午我在附近饭店设一桌饭局款待。在座者多是阔别多年,再次相逢,情绪激动,交谈